



「法」安妮·埃尔诺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著 胡小跃译
《另一个女孩》

替代的生命

□张怡微

年前张悦然找我填写一个问卷，是一些关于女性自传体小说的问答题。我填了很久，甚至很长时间答不上几个字。想了很多问题，尤其是关于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及她基于自身经历的多部创作。

虽然感觉十分尴尬，又很怕被误解过于自恋，安妮·埃尔诺的出身背景和早年人生经历和我有极为相似的部分。例如出身工人家庭、偶然念私立中学、成为文学老师、除了教书之外投身写作、居然还没有饿死……甚至是被疯疯癫癫的亲戚告知自己不是父母唯一生育过的孩子，也勾起了我很不愉快的童年回忆。

“候补式的出生”无疑是要提醒：我们的存在是如此偶然。正如《另一个女孩》中安妮·埃尔诺写的那样：“我的生是用你的死换来的”。这样的故事是那么普遍，普遍到我们甚至忽略了时代背景、文化禁忌，以及尚未被习得的现代心理学常识：为什么这个幽灵般的姐姐让她如此痛苦呢？因为这幽微地关系到孩子对父母无条件的完美信任在姐姐突然出现的那一刻灰飞烟灭。安妮在听到那个消息的瞬间，心中坚固的部分崩塌了，这既是情感层面上不幸的开始，换一个角度说，也是“文学”这看似高不可攀的事业萌芽于一个工人家庭的神秘开端。她开始思考自己的生活圈不被鼓励思考的问题：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这里，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我们为什么要经历这样的痛苦？以上的素材，在安妮·埃尔诺的作品《一个男人的位置》（写父亲）、《一个女人的故事》（写母亲）、《一个女孩的记忆》（写自己的青春期）及《另一个女孩》（写早夭的姐姐）中均有成熟的表达。我很喜欢这几部作品的结尾，作家穷究己见，写父母对自己的祝福是那么残酷：“或许，他最大的自豪，甚至他存在的证明，就是我已经属于曾经蔑视他的那个世界。”（《一个男人的位置》）

有读者尖利地评论安妮·埃尔诺就是法国“菜农”，乍一看有点道理。“菜农”是《我的天才女友》中的主角之一，她有一个“天才女友”叫“莉拉”。在贫穷的意大利那不勒斯，“莉拉”野蛮生长，写作、制鞋、当肉联厂工人，甚至还能学习编程。同样出身底层的“菜农”则通过平凡的高等教育完成了保守路径中的自我实现。“莉拉”是更文学性的人物，“菜农”则符合主流趣味地记录“莉拉”谋生：不是把“莉拉”当素材，就是把“莉拉”当论文中的受访者。这也是当下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最熟悉也最不道德的知识生活。和安妮·埃尔诺许多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安妮”一样，“菜农”后来嫁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生育子女。刻薄地说，“菜农”经过不懈努力，最终成为了一个十分无聊和不怎么快乐的小知识分子。不管是法国“菜农”，还是意大利“安妮”，这些可以预判的人生发展在性别不友好的环境中，居然可以成为传奇，其实是很讽刺的事。

幸好有文本之外，社会学意义上“安妮·埃尔诺”这样的女孩并没有满足于于此，她没有真正被收编。一些不好听的标签一直萦绕在她的周围，她毫不避讳把它们放到台前。这种暴力真相在安妮·埃尔诺笔下十分明朗，即“安妮”父亲所认为的“你配享受这样的生活”的幌子并不可靠，受辱和羞耻的感受才是普遍的。阶级移民和任何形态的移民一样，有足够的霉运亲历丑陋的人类世界。这些想法在安妮·埃尔诺的许多访谈中都有体现，例如她说诺贝尔文学奖分散了她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获奖并没有改变她的处境。

初读安妮·埃尔诺时，我的感觉并不惊艳。因为不懂法语，也许会有大量意义的损失。她写的都是我熟悉的那种平民生活外观。但我仍然被她深深吸引，因为阅读她，我甚至有动力去找出大学时期精读过的旧书，法国哲学家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可以说，是故事帮助我们重新了解人类，而了解人类之后，才能了解不平等公约是如何渗透至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如果安妮·埃尔诺放弃了抵抗，那么她就是“菜农”；她没有，那便不是。或者说，她只是把自己作为方法，使得“安妮”成为一种全世界范围的普遍的处境和可能性。《另一个女孩》是与我擦肩而过的经验素材。我放弃了它，但安妮·埃尔诺重新研判了“替代的生命”背后的社会学意义，例如为什么家里只能有一个孩子，为什么另一个孩子会有如此深切的嫉妒心和罪恶感。平行世界中许多“安妮”正在面临以身犯险的各种危机，通过个人记忆为桥梁，进入公共生活，包括进入不熟悉的阶层，进入不受欢迎的意识形态，进入自由情欲的惨烈后果。比起“阶层移民”的标签，安妮·埃尔诺处理身体、生育和法律及社会习俗变革的紧张关系，显然更有先锋的意义。

她一直没有变，她说：“我为我的阶级复仇写作。”让我想到陈映真的《山路》，以及其他种种。



「美」约翰·威廉斯 上海人民出版社
著 杨向荣译
《斯通纳》

所幸追求过真正的自我

□陆运

终其一生，作家约翰·威廉斯在20世纪美国文坛很难称得上一流角色。尽管毕生从事创意写作的教学，也曾问鼎美国文学最高奖国家图书奖，但在其生前，威廉斯始终为自己作为一名小说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耿耿于怀。但在其内心，作家始终对自己作品（尤其是《斯通纳》）的价值保有高度的自信。

历史的评判是公正的，时间没有辜负威廉斯，在他去世后的第12年，《纽约书评》出版社主编埃德温·弗兰克无意中从一位旧书商那里得知这本只印刷了不到2000册的小说《斯通纳》，“20世纪美国文学一颗伟大的沧海遗珠”被就此打捞出水。在此后的数十年里，《斯通纳》在欧美文学界的声誉和市场表现达到顶峰，既叫好又叫座，受到专业评论人和普通读者的一致推崇。一个被屡屡提及的“天文数字”是，在人口不到1700万的荷兰，这本书至少发行了50万册。2015年，《斯通纳》被译介到中文世界，同样引发巨大关注——我阅读的这本是2016年初版，而到2020年已经重印了14次。

有意思的是，《斯通纳》在初版50年后获得的这次巨大成功，与其平淡无奇的叙事风格和主人公味同嚼蜡的人生经历，形成一种奇妙的对照。20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波诡云谲，方兴未艾的反战斗争、民权运动和嬉皮风潮在大西洋两岸卷起惊涛骇浪，欧美小说叙事革命犹如巨大的旋涡，更加令人目眩神迷。但《斯通纳》却对当时人们关心各种现实问题都不关心（这也是它在第一次问世时铩羽而归的主要原因），作者摒弃了几乎所有文学技巧，老老实实地叙述了一个老学究“平凡而失败”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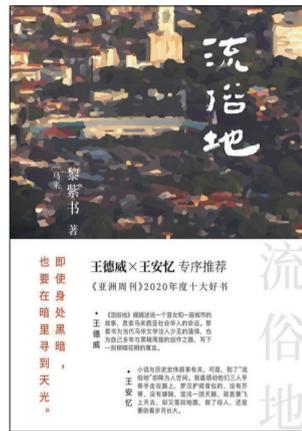
出身稼穡艰辛农家的少年斯通纳，因为偶然的原因进入大学农学院，却在文学概论课上发现了一个广阔的精神世界，并有如天启般地发现了志业所在，也第一次触碰到真正的“自我”。文学彻底改变了斯通纳的人生轨迹，他获得了大学终身教职，迎娶了门户并不相当的上流社会小姐。然而斯通纳很快发现，崭新的婚姻与学术生活的缺憾和禁锢并不比少时的农场世界更少。从世俗的角度看，斯通纳自那以后的人生无疑是失败的：他的婚姻从蜜月期就开始宣告破裂；女儿不堪母亲的摆布，不惜以故意怀孕的方式逃离监狱般的家庭；在和同事的学术争斗中，坚持原则的斯通纳败北，两人从此势如水火，斯通纳的事业再无起色，终生都只是一个边缘化的助理教授……

与这个表面上去黯淡灰色的人生故事相反，作者威廉斯本人并不认为斯通纳是一个失败者，在他心中，斯通纳“是个名副其实的英雄”，“显然，他的生活比大多数人要好。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也充满感情，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意义重大……工作给他某种特别的身份感，成就了他的自我。”威廉斯赋予主人公的姓氏Stoner，直译就是“石头人”，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比喻。为了阻止一个只想把博士学位当作敲门砖的学生通过论文答辩，斯通纳不惜与同事决裂，公开表示“说穿了我就是想阻拦他拿这个学位”，因为这样的投机分子“要是当上教师，那将是一场灾难”。这时的斯通纳，仿佛一块真正的顽石，斧不能劈、火不能烧，在人伦与人际的罗网中，以不辩解、不抵抗、不逆来顺受默默前行的姿态显示顽强的意志，守护身后精神世界的大门，抵抗现实世界的入侵。用他自己的话说，“大学就像一座避难所，一个远离世界的庇护所……我们不能让他进来。因为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变得像这个世界了，就像不真实的，……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把他阻止在外”。在捍卫“自我”的战场上，斯通纳始终孤身一人，在与生活的抗争中，他节节败退，却从来不曾退却。更重要的是，经由自己的痛苦，他真切理解了这个时代共同的痛苦。

斯通纳始终记得面对自己是否该投身一战战场的征询时，导师阿切尔·斯隆对他说的话：“你必须牢记自己是什么人，你选择成为什么人，记住你正在从事的东西的重要意义。有很多人类的对抗、失败和胜利，并非军事之争，史书中也没有记载。当你试图决定要做什么的时候要记住这个。”这几乎可以看作《斯通纳》全书的核心。威廉斯正是要借此唤醒读者发自内心的自省，去评判在整个人生的意义上，究竟何为失败，何为胜利。

斯通纳精神世界的大门，因为当年导师大声诵读的莎士比亚第73首十四行诗而打开，尽管那时斯通纳根本无法解释这首诗的含义。回望人生，斯通纳应该会感叹自己何其幸运，因为这世上大部分人，终其一生或许都没有机会推开那扇门，去体会更深刻的悲伤与喜悦。当生命走到终点时，斯通纳终于明白，那扇门后的生活，是“唯一不曾背叛过自己的生活”。

删人快语



「马」来西亚 黎紫书 著
《流俗地》

一万条小溪奔向大海

□蒯乐昊

这些年读长篇小说越来越成了一件值得郑重的事情，但黎紫书二十八万字的《流俗地》却让我结实实地读了两遍，正打算开始第三遍。

在评论界，《流俗地》反响不俗，王德威、王安忆等人都盛赞此书是不可多得的上佳之作。作为马来西亚华语作者，黎紫书自写作以来成绩不断，花踪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时报文学奖、大马优秀青年作家奖、南洋华文文学奖、“红楼梦奖”等重要奖项悉数收入囊中，但她长达二十五年战战兢兢，以文学“素人”自惭，直到写完《流俗地》，才长舒一口气，认为从此终于可以担得起“小说家”这三个字了。

黎紫书笔下的流俗之地“锡都”，原型就是她的家乡怡保，因此她有“吾若不写，无人能写”的使命感。这座马来西亚北部山城以锡矿驰名，一两个世纪以来，采矿垦殖的移民陆续到此，亦带动其他行业，形成丰饶生态，洋杂丛生。马来人、印度人、华人、印尼人、孟加拉人，携带各自文化基因，在这里形成一个纷繁庞杂的多元族群社会，仿佛大江大河的合流处一般。

小说主人公银霞是个盲女，她生活的近打组屋，又称为“楼上楼”，正是南洋社会底层的典型形态——不了解马来西亚的读者，也可以比照香港周星驰电影中的“九龙城寨”展开想象：贫穷逼仄的热带笼屋，重重叠叠，寄居在里面的所有人，是不得不向生活低头的人，但谈起来都会说：谁能一辈子住在这种房子里呢？更有失意者常常选择此地来跳楼，女鬼们带着一世的冤屈阴魂不散。为了杜绝惨案，近打组屋后来加装了铁丝网，让这里显得更加绝望、压抑，形同牢笼。

银霞、细辉、拉祖三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在组屋长大，人称“铁三角”。银霞目盲，无法接受教育，但依然聪明过人，印度男孩拉祖懂她，常用印度智慧之神迦尼萨来提醒她，象头神断了的右牙，象征着为人类做出的牺牲，凡有残缺者，必是为牺牲者过了。一次打赌中，银霞赢得奖品——一块电子手表，但出题者却执意把手表送给拉祖，理由是银霞根本看不了手表，给她也是浪费。只有拉祖坚持把手表戴到银霞腕上。她始终保留着这块表，直到电池耗尽，塑胶带发黏，也不肯丢弃，妹妹问她到底在纪念什么，她说，纪念拉祖，提醒我拉祖是一个光明的人。对先天盲者来说，“光明”究竟为何物？细辉是学电机知识的，他告诉银霞，组屋里一直嗡嗡作响，类似宇宙之初的“噤”声，是日光灯管镇流器发出的声响。从此，“光明”有了听觉上的指标，只要听到那个声音，黑暗中的银霞也知道有了光。

《流俗地》虽然用力在“铁三角”的成长，但并不仅仅只写这三个人，它更像是一幅长卷浮世绘，是马来社会的众生相：来自渔村，傍上拿督后摇身一变成社会名流的莲珠；永远眉目竖目，最后咳死在血污之中的何门方氏；因寡情导致学生横死，自己也陷入噩梦的婊娟；二度嫁人，投靠黑帮人物才换得晚景安稳的马票嫂；丧偶式婚姻的牺牲品梁金妹；所爱非人，葬送了一生幸福的惠兰；十六岁就大起肚子的春分……跟前景里的这些一咏三叹的女人相比，男性更像舞台远处影影绰绰的背景：因为不伦恋、铤而走险混进黑道的大辉；开着老掉牙出租车乘机撩骚的老古；独自一人抚养女儿长大的叶公……无数凡俗小人物的命运不舍涓滴，泥沙俱下，也像一万条河流奔向大海。

黎紫书笔下的爱情更见功力，几乎全程不动声色。在银霞静水流深的沉默缱绻里，细辉笑或不笑，楼梯间的气味是不一样的，她看不到，但是她闻得到。后来这种谦卑的暗恋转移到老师伊斯迈身上，盲人点字机帮她记下无法递送的情书，老师笑起来的时候，她能感受到空气中的变化，世界会滑向一边，逐渐倾斜。最让人惊骇的是，银霞的命运如同刺客图穷匕见，一直被蒙在鼓里的读者，直到小说的三分之二处，还把银霞看成一个个清汤寡水无故事的女同学，小说家似那种嘴巴严极了的地下分子，始终咬紧牙关，一次只吐露一点点，直至结局才渐渐揭开惊天真相。

真相是在一片漆黑的故障电梯里被说出来的，唯一的听众，就是小说接近尾声时才出现的顾老师，仿佛天降救赎者。他与银霞分头饲养的猫咪，白天叫作“疤脸”，夜晚叫作“普乃”，最终合二为一，团圆了日夜，弥合了人世间一切残缺。

顾老师的名字叫：有光。